

政治经济学論文选集

王亞南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論文选集

王亞南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57年·福州

政治經濟學論文選集

王亞南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

福建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25 印張5 19/25 字数110,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90

序 言

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編輯部希望我把近几年來陸續發表的有关政治經濟学的論文，輯为專冊，以供學習研究政治經濟学的同志們的參考。我初步檢出了这十一篇文章，按照一定的邏輯系統編列出來，題称为：“政治經濟学論文选集”。这个选集，也許不大適合于初学者，而比較更適合于有一定經濟学基礎的讀者。

这十一篇文章先后發表在“學習”、“新建設”、“經濟研究”、“廈大學習報”、“光明日報”、“福建日報”諸报刊上。第一篇第二篇提出了政治經濟学在新中國的新任务和根据那个任务確定的我們新經濟学界的研究总方向。學習政治經濟学这种党性科学，最怕認不清任务和迷失掉方向，这两篇可以作为學習政治經濟学的途徑与方法的導論而提出來。

第三篇第四篇是就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与資產階級經濟学兩個本質不同的体系，來說明我們所學習的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究和資產階級經濟学有怎样的区别？又怎样去区别？假如已經区别开了，又怎样去从資產階級經濟学的學習中獲得教益。

第五、六、七、八篇是从理論联系实际的角度的，來考察我們學習政治經濟学的方法。我在第五篇提出了政治經濟学的理論联系实际問題，要从兩個方面得到理解：一方面是要把理論，把原理、范疇、規律，回到它們所反映的实际中去，另一方面就是要把这些应用到我們的现实經濟中來。我們的學習过程，应当是这两兩方面的不断反复推动过程。第六篇的內容，大体可借以說明前者，第七篇第八篇的內容則基本上可借以說明后者。

第九篇是在百家爭鳴中，对各方有关生產力与生產关系的發展問題的討論，提出一个較全面的說明。第十篇原是表述个人學習“資

本論”的心得的。但讀者可以從這篇文章中了解到我是在如何企圖努力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方法，來處理一切方面的經濟問題，雖然從本選集中包括的論文看來，我的努力並不很成功。最後的一篇，是講述在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中學習“資本論”的重要意義的。

學習政治經濟學最怕辨不清方向，分不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本質，含糊籠統，胡子頭髮一把抓，那一來，就根本談不到聯繫實際，和為我們新的社會服務了。反之，如果我們已分別在立場、觀點、方法上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區別開來，我們就能明了：我們為什麼要學習資產階級經濟學，為什麼要從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學習中取得教益，為什麼要使理論聯繫實際以及如何去使理論聯繫實際。如其說學習政治經濟學有什麼捷徑和有效方法，就應該說是指着這些方面了。

為了使全書各篇的邏輯系統更聯貫醒目一些，我把其中若干篇的標題略微改動了一下。自然，把前後在不同場合分別發表的論文集輯起來，就是它們的內在的聯繫再密切一些，也是不如特地按照一個完整提綱寫出來的系統。但就一些關鍵論點發揮的深度和闊度來講，這種論文集也許還更有益於一些有了社會科學基礎知識的讀者。

最後，我得補述一下關於目前反右派鬥爭中捍衛發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务。在資產階級右派提出的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中，就有一項把恢復并尊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當作發展社會科學的內容。那很明顯地是企圖用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在社會科學中，政治經濟學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有階級性戰鬥性的科學，因而資產階級學者也就最重視如何打擊這門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并貶低這門科學價值的工作。他們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說成是教條，把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石的“資本論”說成是過了時的教條。在這個論文集中，我相信讀者定會找到徹底反對這一切胡說謬論的理論根據。

王 亞 南 1957年8月

目 錄

序 言

政治經濟學的新任務.....	(1)
新經濟學界的研究方向.....	(7)
怎樣從立場、觀點、方法來辨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不同本質.....	(13)
怎樣從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學習中獲得教益.....	(30)
怎樣理解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聯繫實際問題.....	(44)
怎樣就範疇與規律來區別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和資本主義 經濟形態的不同實質.....	(52)
怎樣把政治經濟學的原理與規律運用到我國過渡時期的 經濟實際中（一）.....	(66)
怎樣把政治經濟學的原理與規律運用到我國過渡時期的 經濟實際中（二）.....	(75)
促使生產力發展的動力究竟是生產力內部存在的矛盾？ 是生產關係？還是其他？.....	(96)
學習“資本論”的一些體會.....	(104)
在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鬥爭中學習“資本論”的重要意義.....	(119)

政治經濟學的新任務

在社會科學中，政治經濟學是最能顯示出階級性、鬥爭性、實踐性的一門科學。一切經濟思想或學說，都直接反映着當時當地特定社會階級維護經濟利益、爭取經濟利益的實踐要求。實際經濟狀況每一度向前發展，各社會階級的經濟利害關係，就要一度發生變化；而分別代表各不同社會階級之不同經濟利益的意見或學說，也就要跟着引起一些轉變。那些轉變或且是表現在研究的重點上，或且是表現在研究的態度上，或且特別是表現在研究的立場上。為了照顧到下面說明的便利，這裡且不妨把現代資產者經濟學界和蘇聯經濟學界的演變情形，分別解述一二。

近一百年來資產者社會的一般經濟發展狀況及其在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不平衡發展狀況，在資產階級經濟學陣營中，引起了極大的變化。在資本主義初期或上升期，為了向當時妨碍商工業發展的封建殘余勢力及其代表意識鬥爭，為了確立起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他們古典學派曾揭露出資本價值增殖運動的諸基本規律，並指出那種運動過程中的諸分配形態——工資、利潤、地租——間的對立與矛盾；不管階級的局限性或偏狹性，使他們的理論留下如何多如何大的漏洞，現代資產者的政治經濟學，畢竟由他們建立起來了。可是等到現實的經濟發展，真的照着他們的不完全的指示，把諸分配形態間，特別是把工資與利潤間，把勞動者階級與資產者階級間的矛盾與衝突，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了，即到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及其統治，有些感到日漸從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增大成長起來的勞動者階級的勢力的威脅了，於是，在各國繼起的經濟學者，就分別照應着他們各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狀況，或大體按照各國資產者階級提出的要

求，而把研究的重点，由生產移到分配，再等而下之，移到消費；把研究的立場，由進取移到保守；對於研究方法，也相應加強形而上學化，以回避現實，掩飾現實來代替暴露現實。根本否認各社會階級利害衝突的，是以美國加雷為首班的所謂調和學派；相當承認階級利害衝突，但以為可借“超階級的”國家力量去調解的，是德國的歷史學派；知道階級利害衝突，既不容否認，又不易調解，乃極力用“超歷史的”形而上學的說教去蒙糊掩飾的，是發端于維也納大學的奧大利學派。這派所強調的主觀主義、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頗投合現階段英美各國腐朽資產階級的脾味，所以，今日支配着英美資本主義國家乃至殖民地次殖民地國家保守的經濟學界的所謂英美經濟學，仔細分析起來，就不过是奧大利經濟學的一個變種。

可是，當客觀經濟事象的發展，以及由是引起的社會階級利害關係的變化，使一個站在保守地位的階級及其代言者，需要講謊話，要騙唬，弄玄談，並極力去發掘發揮其先輩古典經濟學中的庸俗見解，來反對那種經濟學中的科學理論部分的時候，與他們恰好站在相反地位、相反立場的新興勞動階級及其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則正好是要講真理，說實話，尽情暴露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的矛盾，尽情批判洗刷古典經濟學中的庸俗見解，並將其科學理論部分發揮發展起來，而由是顯示出資本主義沒落的必然性，和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蘇聯的革命與建設的成功，使我們很有根據地相信，那是由於他們的領導者極靈活機動地運用了發揮了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有力武器的結果。比如在一个資本主義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實行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以一個被資本主義包圍著的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建設；以一個無產階級的政權，毅然決然推行帶有資本主義成分的新經濟政策；等到國家經濟成分、集體經濟成分的生產規模，發展到足夠應付國內需要，即是說，已有足夠的物質基礎來打擊資本主義的成分或富農，就很迅速地提出打擊富農的新決定。諸如此類的現實社會經濟的發展斗

爭過程，同時皆在一般意識形態上，特別在經濟學領域內引起了最激烈的論爭、決鬥與清算。這種經濟學的理論鬥爭，大體是沿着兩個方面進行，一是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及其前途的不同估計，一是對於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總路線及其發生的經濟諸般問題不同的看法。這兩方面的理論鬥爭，在表面上是分別平行的進行，事實上却揉合在一起，這正因為蘇聯國內的反革命殘余勢力，是與國際資本主義對蘇聯的陰謀暗算聯結在一起的。所以，當蘇聯在國內社會經濟結構中，還殘存着非社會主義成分的時候，甚至當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已確定地壯大地建立起來，而國外資本主義勢力還當作一種威脅存在的時候，政治經濟學上的反動的不純的見解，就不免要以各種姿態殘留着，“對於鬥爭和建設的實踐上發生直接的影響。”特別在由十月革命到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這一段最艱苦因而鬥爭也最激烈的時期內，經濟學上的觀念論和機械論的傾向的代表者，托派、布哈林派、魯濱派人物，曾假借馬列學說之“新”理論、“新”解釋這種招牌而出現（以上引句，均見莫譯柯·杜著“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第4頁）。由於他們戴着馬列主義經濟學者的頭銜，散布反馬列主義的毒素，所以斯大林在當時一再告誡蘇聯經濟學者，要警惕，要在理論上趕上並超越現實經濟的發展，不要為各種反科學成見所迷誤（見“列寧主義問題”中譯本第377—400頁）。一句話，蘇聯在革命和建設實踐過程中，曾克服過許許多多的險境和難關，使社會主義得向前發展，同時，那也表現它在理論上、在政治經濟學上，曾糾正了各種各色的反動的不純的謬見，才使馬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得向前發展。

資產階級經濟學界，蘇聯經濟學界的那種分化、鬥爭和演變的情形，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呢？有什麼值得我們參証鑒誡的呢？

第一，那表明，實際經濟狀況每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新的階級利害關係，就要對於政治經濟學及其研究者提出新的要求，加担以新的任務。

第二，又表明，旧社会的意識形态，往往成为新社会發展的阻碍；在旧經濟成份，旧經濟势力还多少被保留下來的情形下，圍繞在政治經濟學上面的斗争，將为思想斗争階級斗争中的最生动曲折的一部分。

第三，还表明，政治經濟學的这种濃厚的階級性，就决定了它的党派性，列宁曾把政治經濟學与認識論看为党派性的科学，就是說，領導階級斗争的政党，必得掌握住政治經濟學及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作为战勝階級敌人的有力武器。

× × × ×

然則我們目前的新形势、新环境，对于政治經濟學或我們政治經濟學界，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呢？換言之，在我們人民國家立在領導支配地位的工人階級政党，將怎样發揮这一党派性科学的作用，或將怎样明確地確定它的中心任务呢？大体說來，那种中心任务有兩個：

其一是：使一般从事社会主义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工作的人，对于馬列主义，对于党的政策，不但有明確的認識和研究的信心，并还有努力促其实现的热忱与决心。

其二是：使那些在目前及將來担任实际建設工作的人，具有計劃管理的才能，而政治經濟學之学术性的較高深的研究，也是要在这种实践要求上取得其意義的。

前一任务，是向一般知識界提出的；后一任务，是特別向經濟學人提出的。在当前“一切方面，皆从發展生產出發”，一切力量，皆集中到經濟建設方面的号召下，后一任务的达成，当然非常重要。但經濟技術管理指導的專長，并不能完全期之于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学本身，那同时必須期之于与政治經濟學密切关联着的一般經濟技術方面的科目。研究各种有关經濟技術科目的人，他們學習政治經濟學，当然比較那些担任文化政治建設工作的人，有較多較大的意義（如作为進一步研究各种經濟學說的基礎），但其主要目的仍在使他們对新社

會建設具有最大的信心，和為新社會建設表現最大的熱忱。事實上，一個對新社會建設認識不清，因而對於其前途表示懷疑的專家，他就不但不願發揮其專長，且也會使其在舊社會所受到的技術訓練，不能適應新的作風與環境。所以斯大林曾就經濟技術人材的需要，作如下的指示：“我們並不是需要那一種工業指揮人材和工程技術人材。我們所需要的是能了解我國工人階級的政策，能領導這個政策，並決意誠懇把它實現出來的那種人材，而這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已經走入這樣一個發展階段：這時工人階級應當造就他自己的生產技術知識界，即能維護它這個統治階級在生產中的技術利益的知識界。向來無論那一個統治階級，都一定要有它自己的知識界。蘇聯工人階級當然也一定要有它自己的生產知識技術的知識界。”（見“列寧主義問題”中譯本第459頁）從這個指示中，我們知道：我們新中國所需要的經濟建設領導人材，並不僅是有了生產知識技術知識就行，必須他們了解無產階級的政策，“且決意誠懇把它實現出來”，才真算是我們所需要的技術知識界的人材。否則，不論他們的生產知識如何豐富，管理指導的技術如何高明，他們腦子里如其充滿英美庸俗經濟學所培育的市儈主義、享樂主義，表現出十足的官僚習氣、買辦作風，他們不但不能成為我們經濟建設上的助力，且會成為阻礙。

在一個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生產技術人材或經建人材，本來是相當缺乏的，而我們臨到目前這個轉形改造階段，要創造出自己所需要的生產知識、技術知識界，就除了把已有的，即在買辦官僚教育制度下培育的人材加以改造外，就是加緊創造新進的優良幹部。然則我們將怎樣去改造他們創造他們呢？那最先最必要的，就是實踐生活中或聯繫着實踐生活去學習馬列主義，學習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即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學習馬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由這種新認識論，使我們對於認識社會改造社會，採取工人階級的立場和唯物主義的觀點，以及暴露矛盾、克服矛盾的辯證法，並由體現着這種思想方法的

新政治經濟學，了解我們社會何以必須采行這種新經濟形態，並如何加速造成這種經濟向着社會主義前進的步驟與途徑，即是說：“無產階級的黨，為要有可能去影響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並加速其發展，便應憑借這一社會理論與社會思想。這種理論和思想，能正確反映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需要，因而能發動廣大民眾，能動員他們，把他們組織成一支決意打破社會反動勢力，並為社會先進勢力開辟道路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偉大軍隊。”（“聯共黨史”新譯本第149頁）

因此，人民國家所加担於政治經濟學的新任務，或我們研究這門科學的最基本要求，與其說是在獲得一些空泛的經濟知識，熟習一些書本上的經濟規律與聯系，就無寧說是在改造我們的思想，使我們在經濟上乃至在其他一切社會文化方面的活動和努力，皆能科學意識的依據“生產發展的規律”，依據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

（1950年5月）

新經濟學界的研究方向

一 新經濟學界與舊經濟學界

不論那一种政权，“不論那一个統治階級，都一定要有它自己的知識界”（“列寧主義問題”第458頁），把範圍縮小一點，就我們這裡的論題說，就是一定要有它自己的經濟學界。

中國現代的封建買辦官僚統治，在其形成過程中，雖曾因封建主義與買辦資產階級在某些方面的抵觸，而相應引起了傳統封建經濟意識與買辦資產者經濟意識之間的衝突，但由於在國際資本的作用下，買辦官僚政治，買辦官僚經濟，逐漸取得了對於封建主義地方主義的支配權，於是，買辦資產者經濟意識——功利主義、市儈主義、壟斷主義以及由客觀技術主義與主觀主義限界揉合而成的形而上的經濟教義，就相應把傳統封建經濟意識，即道本利末，重農抑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那一套見解，屈服在可憐而尷尬的地位，而確立其領導支配的權勢。晚近二、三十年來的中國經濟學界，就這樣當作中國買辦官僚統治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而且盡着對於那種統治在經濟方面之宣揚與彌縫的職能。

可是，就在中國買辦官僚統治形成過程中，反對那種統治形態的前期國民革命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也在斷續地逐漸地增大其對抗力量。就因此故，一向為買辦官僚統治服務的經濟學界，亦自始就蒙受着“異端的”批判經濟理論的駁斥與困擾，等到人民革命勢力向全國席卷起來，整個買辦官僚統治階級固出盡了醜，徹頭徹尾表現了脆弱與無能，而當作其重要構成部分的經濟學界的領導人物，則在全國統治破產的經濟這一方面，用接連不斷的“新經濟措施”、“新

經濟方案”……來表示他們的愚昧和無恥。

在目前，買辦官僚統治已經作着歷史的結束，而當作其陪葬物的買辦資產經濟學界，也宣告壽終正寢了。

代替買辦官僚統治的人民的新政權，必須有它自己的經濟學界了。

在新舊經濟學界作着歷史交代的當中，我們對於已經成為過去的舊經濟學界，沒有什麼好說，而對於日益壯大的新經濟學界，則希望在其的研究總方向方面，略述我個人的意見。

二 一序列待斟酌的問題

新經濟學界的研究方向，已經有不少經濟學人斷片地提論到，如配合新經濟實踐，如少談舊經濟多談新經濟，如通俗化實用化……不一而足。在明確提出研究總方向的原則之前，似乎需要通過諸如此類的較具體問題的說明，所以，我先就以次諸論點，加以解述。

（一）社會與技術。關於經濟研究上的社會性與技術性的問題，有兩點意見值得提出來加以商討，其一是：我們時常責難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說他們對於一切經濟問題的看法和處理，都形而上地不顧其社會屬性，只是在技術上枝節地用功夫，於是有人就在那里劃一條分界綫，說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只注意經濟問題的技術面，新經濟學者則注意其社會面，這是對的么？又其一是說：當一個社會正在轉形的时候，應注意研究其經濟問題的社會性質，轉形已大体告成了的时候，則只注意研究其技術性質，這又當作何解說？這是兩個大問題，但篇幅限制了我的詳細說明。當我們指責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為了回避現實或不敢正視現實，只把一切關係社會性質的經濟問題，作着枝節的技術處理的时候，那並不意味着反對他們的新經濟學者，不重視技術條件問題，恰恰相反，每個真正的新經濟學者，都是徹底的唯物論者，都是把問題的解釋與解決，訴之于客觀物質條件的實證論者，在一定

社會關係下，客觀的物質條件可能具備到什么程度，可能應用到什么程度，他們不會把自己的幻想和希望，帶到解釋或解決問題的可能條件里面去，而慣于這樣做的，慣于把希望當作事實的，倒反而是那些唯技術論者。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的權威，不都是一些一面強調技術，一面卻又強調主觀、重視心理的二元論者么？至若社會已經完成了變革過程以後，可以不要再在研究上重視社會性質，那是相對的說法，是要加進去許多限制方可成立的命題，是說在討論問題的過程中，已經不要象在以前強調社會變革時那樣，把社會性質，把政權性質，提到作為解決問題的前提條件的地位。事實上，那怕是在一個嶄新的社會，仍有它的不同發展階段。列寧曾這樣提醒我們：“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都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列寧主義問題”第722頁）

（二）理論與實踐。站在新的研究立場的人，都強調着理論要符合實踐，都是為了反對理論研究與實踐脫節而提出的。那不能以詞害意的理解為理論跟着實踐跑，理解為理論對於實踐沒有指導作用。我們一再講過，新社會學、新歷史學成立以後，一切的革命行動，都成為科學意識的行動，都成為有一定理論根據的行動。“沒有革命理論，就不會有革命運動”的這一系列指示，斯大林是用“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來注釋，後者并駁斥普列哈諾夫責列寧不注重理論為一種奇怪見解；他以為“許多列寧主義實際工作者，由於環境關係而不得不忙於實際浩繁工作，而不很愛好理論，而又忽視理論的趨向，是完全與列寧主義的精神相矛盾，而且有發於其心，害於其事的極大危險。”（“列寧主義問題”第35—36頁）理論對實踐的重要性，實不僅因為每種革命的實踐措施，要每個實際工作者有了理解，才能熱忱地工作或有效地領導，而更要緊的是因為要他們有了理論的基本修養，他們才能在實踐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特定場合，提出新的見解，以充實并發揮那種基本理論。理論與

實踐在這種意義上的統一，才算是達成了理論配合實踐，或實踐依據理論的要求。把這關係一般的說明，移到經濟研究的領域來，就是：空談經濟原理，誠有類于玩弄觀念，無的放矢；但如一旦知道注意經濟實踐，並且已在革命的經濟實踐過程中，我們就得明了，離開了經濟理論是寸步難行的。

（三）舊對象與新對象。關於經濟研究，一般原在採行兩種方式：一是依據既成的經濟原理，去探究現實的經濟事象；一是依據現實的經濟事象，去証驗經濟學原理。在實際上，這兩種研究方式是在同時並行着的。但一個社會如其是臨到新舊交替的關頭，特別是在求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場合，對於所研究的經濟對象，就無法只是注意當面的，新的，而不涉及其既成的，舊的。從原則上講，舊社會的生產力，或構成那種生產力的諸經濟因素或條件，到了新社會，只是看作新生產力（在一定新生產關係下結合起來的）的“原料”，但這要看那種除舊布新的革命的徹底性如何。假如對舊的生產關係還有所保留，則每種新的經濟措施，就要同既成的社會經濟關係，打一番交道，或者要對既成的社會生產關係，以及附麗於那種關係中的舊習慣，舊意識，舊作風，有一番徹底的理解。否則，社會轉形的大計，就將因為我們對於舊的太隔膜，而無由達成更新的任務。所以，在轉形開始的場合，就忽視對於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濟形態的注意與研究，或將不免在改革實踐上蒙到一些觀念主義的不利影響。注意研究新的經濟對象，同時還要忽視舊的社會經濟關係，這是我們處在轉形期中的經濟研究者所無法避免的雙重負擔，並且這負擔，還顯然因為我們當前革命容許中小資產者合作的性質而加重了。

（四）深化與通俗化。一切在過渡中在轉形中的社會經濟事象，一般都是比較錯綜複雜的，而注重技術條件，注重實踐程序，又更增加了經濟理解的深度與闊度，於是，經濟理論的深化與通俗化的問題就發生了。從表象上看去，深化與通俗化是正相對立的。但仔細考察

起來，就知道那正好是相生相成的。深化的意思，是要在一個經濟理論體系之下，把更多联系、更加曲折的內部因果關係，揭發出來，而對於那樣揭發出來的因果關係，用極明白淺近的道理或實例表達出來，就是通俗化。比如，熟練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概念，以及依據那種概念建立起來的非平均主義的工資支付原則，本來在馬列主義理論中，是相當深入的部分，但我們在轉形社會中，把它拿來解釋要注重效率，增加生產，就不能採用平均主義的道理，却就能使每個沒有什麼深入理論修養的工資勞動者，都懂得非常透徹了。進步的社會階級，得隨時依照其進步的程度，提高知識水準，提高經濟理論水準，這種提高知識理論水準的著作，雖然不能完全期之於一般人民在實踐中的自發的體驗，但他們却因為要做一个進步社會的有效率的實際工作者或革命實踐者，而有理由要求進步的經濟知識與理論，在一定範圍或程度內，變成爲他們的东西。在另一方面，因為大家這樣要求理論，應用理論，並通俗化理論，又反過來成爲把理論引到更廣泛的界，更間接联系上的深入的前提。

這一序列問題經過了上面的簡括說明，我現在可以略有所據地指出我們新經濟學界的研究方向了。

三 總方向

當作新政权、新社會之經濟意識代表的新經濟學界，它的基本任務，顯然在研究如何可以減少自然歷史障礙的從速實現新的社會經濟體制。這可以說是我們新經濟學界的總的研究方向。在這種基本任務下，在這種總的研究方向下，在目前，或者至少在目前，我們應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以次諸方面：

第一，是馬列主義經濟理論的發揮與普及——馬列主義經濟理論，是世界各落後國家創建新社會經濟體制的最高原則。我們必須明確理解並靈活運用那種最高原則，始能堅定我們革命的經濟實踐的信